

# 纪念七七事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一组发言

编者按: 1997 年 7 月 4 日, 纪念七七事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原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名誉所长戴逸、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教授李云汉、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卫藤沈吉、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吴天威、香港慕光英文书院教授杜学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 先后在开幕式上发言, 本刊选载了其中 5 篇。

## 抗战胜利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吕正操

各位专家学者, 各位女士、先生: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 60 周年。60 年前,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 妄图占领整个中国, 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但是, 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决不屈服。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全国军民奋起抗战, 流血牺牲, 打击敌人,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拿起锄头刀枪, 奋战不已。经过长达八年之久的艰苦抗战、英勇抗战, 终于打败了日本法西斯, 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这是中国人民 100 多年来反对外来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我是东北辽宁人。1931 年九一八事变,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的家乡。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指导下, 我们东北军撤到了关内。蒋介石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 不要我们打日本。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主张, 影响很大。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 扣压蒋介石。在共产党帮助下, 这次事变和平

解决,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祖国危亡,才有中国的出路,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一直战斗在敌后,先是在冀中,后又在晋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战场广大军民英勇抗战,到处打击敌人,歼灭日伪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政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现在我们全国正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现代化事业的建设。我们研讨抗日战争问题,就是要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祝贺讨论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 伟大的转折

刘大年

60年前的7月7日,就在我们今天开会的卢沟桥这个地方,开始了连续8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抗战一爆发,人们就着手了对事变的记载和评述。其中有后人无法代替的,但当时所知肯定是有限的。如今岁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那段历史,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比较全面的认识了,虽然就像对于其他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一样,总有这样那样的分歧,要继续研究讨论。

照我们现在达到的认识来说,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中国在近百年里头一次取得了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内部政治力量这时头一次发生了有利于人民方面的对比。这两者集中起来,从实际力量上准备了新中国代替旧中国,为最后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两大基本矛盾开辟了道路,这两大基本矛盾,一是民族丧失独立;一是社会生产落后,各方面缺少近代化。抗战以后紧接着的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三年多就全局分晓,突出显示了抗日战争推进历史转折,选择中国前进方向

的作用。第二,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同时也是人民战争。抗战爆发以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法实现。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它所提出和坚持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贯穿整个抗战过程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无从实现,或者一时实现了也没有什么东西保证会坚持下去,而不遭中途夭折。回顾中国近代历次对外战争的结局,就会明了这一点。从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相结合这方面看,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同样地应该得到客观的全面的评价。抗日战争是全中华民族、即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先辈共同进行的,他们有共同的过去,也就有共同的未来。第三,抗日战争不止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重要性,在日本历史上也有极大重要性。中日两国都在这次战争中和战后发生了极大变化。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都可以而且完全应该从中日战争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前进的道路,是中日两国关系上唯一应该遵循的道路。这是那场严酷战争给予人们的根本教训。日本最近公布的日美军事合作新协议,被国际上一致评论为是给日本自卫队对外作战扫清道路。中国和亚洲人民自然地要表示出他们的关心,人们不应该淡忘历史的教训。第四,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中国抗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和东方的胜利。了解这方面的事实,不止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也涉及如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特别是东方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巨变。抗日战争是那些巨变的开始。抗日战争有何重要意义,这一些,我想是很容易看到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抗日战争不但时间最长,规模空前,中国

遭受的苦难、牺牲也最惨重。战争发生时,日本是一个实现了近代化的军事强国,中国是一个处在半中世纪状态的工业、政治、军事落后的弱国。双方举国以赴,连续恶战8年的结局,日本彻底失败,中国则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怎么发生的,根源在哪里?物体不能从静止状态去简单了解,物体只有从运动中才能认识它是什么与不是什么。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中国民族空前剧烈的运动。人们很自然地要提问:从抗日战争那场剧烈运动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具有怎样的性格、什么特点?中国抗战当然是在一定国际环境、条件下进行的,但它的面貌、格局和结果,最终是取决于自身因素,而非取决于外在因素。这个事实很容易确切证明:抗战8年,前段4年多,中国是在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单独对日作战的。也正是由于这4年多中国的抗战,迫使日本把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扩大、延长为太平洋战争,引起东方全局变化的。因此,探讨和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无疑地具有重要的和深层认识的价值。

关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抗日战争中体现的性格和基本特点怎么样?我以为大致上可以这样说:一,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决定关头,中华民族是一定可以觉醒起来、团结起来的。在这个时候,对立阶级、不同利益的人群一定要转而服从民族生存的共同利益。其中有生存下去的现实需要,也有传统民族大义的驱动。国民党与共产党十年内战转变为合作抗日,使中国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抗战进入中期以后,双方又摩擦不断,以至局部军事对抗。但一直到抗战结束,统一战线的形式仍然保持着。事情就在于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要受民族共同愿望的制约。敌人压迫的客观形势不改变,他们共同对敌的战线也就不会改变。

二,人民大众是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力量源泉和最终支柱。他们抗日的意志和力量释放出来了,中国就能够顶住任何压力,就能够振起固有的坚强民族精神。全面战争开始,“抗日光荣,抗日必胜”,是抗战舆论的基调。从不同社会层次一致发出的声音,表示出对抗战前途和中国复兴满怀信心。年长参政员张一在抗战一周

年纪念会上说，“七七”是中国人最光荣的一天，比双十节还要光荣。希望大家抗战到底，“让中国人永远竖起一条脊梁”。1939年2月，陈嘉庚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提案，全文30个字：“自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抗战二周年，朱自清在《这一天》的文章中说：这一天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中国不但有光荣的古代，如今也有光荣的现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这些言论要求，真切反映了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坚决要求抗日，竖起脊梁，不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决心和激情。日本当时也有人了解和重视这个事实，并且担心日本横蛮压服中国，与中国全民族为敌，给日本带来严重危险。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一些头脑冷静的中日问题的研究者，包括首相近卫智囊团人士、“满铁”研究人员、天津《支那问题研究所所报》撰稿人等，连续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中日两国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它不久将作为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展现在我们面前。“华北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整个支那问题，我们重视的是整个支那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对付支那统一政权的国民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国民政府的武力大概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四亿民众的觉醒与复兴的命运，并不是日本一国势力所能长期压服的”，“现在日本帝国真正面临着兴亡歧路的选择”，等等。日本当权势力根本无视这个事实，不把民族复兴思想日益增长起来了的4亿中国人放在眼里，确信日军只须“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结果走上了最后覆灭的道路。

三、爱国、维护民族利益，是含有新的时代内容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准则。“汉奸国贼”罪名同科。日本从统治中国的需要出发，把一些老牌亲日分子、堕落文人看做中国人的合格代表者，“有力人物”。在占领华北、华中以后利用他们充当头目，建立傀儡政权。实际他们帮不了日本人多少忙，汉奸卖国贼面目的公开使他们不为普通中国人所齿。汪精卫叛国投敌，日本一度寄予相当的期望，

又是“还都”，成立“国民政府”，又是双方签订“互相承认”条约。至今东京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悬挂的历次重要外交事件图像中就有日汪“互相承认”签字仪式的巨幅照片。但是汪精卫一经投敌，就陷于极端孤立，使日本大失所望。裕仁天皇三弟崇仁 1944 年在南京日本派遣军总部与中下级军官讨论战争形势、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汪伪是他们着重谈到的问题之一。崇仁在回答参与讨论者提出的“国民政府没有力量”、“国民政府没有吸引力”等等问题时说，它为什么没有力量，这不是因为民众对它不信任吗？那么，为什么民众对它不信任？说穿了它不过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工具，是日本掩饰其侵略主义施展的一种小伎俩。“其下层官吏、军人，大部分都是由抗战意识薄弱分子、或想利用日本发财而日本又被他们空喊亲日所蒙蔽的一伙人所构成，民众对这样的政府不信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崇仁这位正直勇敢、实话实说的皇族成员，讲出了汪伪及其同类为什么受到群众抵制的实情和本质。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崇尚民族正气，唾弃认贼作父的败类，是一般遵行的通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石敬瑭、张邦昌一类历来是受诛贬的。这个文明社会的通则，如今是增强了的民族凝聚力反映在增强的价值观念准则上。

四，中国人是有能力在历史转折关头，汲取世界先进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去从事革新自己民族命运的斗争的。20 世纪初，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是代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自己环境条件和应当如何前进的主张和认识。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则是代表了孙中山以后的先进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条件环境认识和应当如何前进的主张。它们都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不必说它们怎样完美无缺，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直接或间接与今天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新民主主义论》直接产生在抗日战争过程里，它指陈的基本内容、社会变革全都由后来的历史所检验、证实。民族独立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开通了。事实俱在，不需要论证。

以上叙述,如果基本不错,我想也不能就算是对于前面提出的从抗日战争那场剧烈的运动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具有怎样的性格和特点这个问题的全面回答。但是,有一条可以充分肯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潜力,其中包括悠久历史和高度文化的潜力、接受和发展先进思想的潜力是不应当低估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致命错误就是自恃霸权在握,不可一世,在总体上、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上完全低估了它的对手。这适用于研究抗日战争,或者也适用于估量中国的现实。

历史事实有一目了然的,也有并非黑白分明的。七七事变过去了60年,学术界对8年抗战得出了许多重要认识,但同时,仍有各种分歧摆在人们的面前。抗日战争那段历史过去了,它与今天的现实生活的联系并没有完全过去。可以肯定,某些分歧在相当时间里还会继续下去。照我们看来,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科学性。何谓科学性,不管有谁是否下过什么定义,历史科学的研究,归根到底,一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的要求是客观的,原则上是带有共同性的。无论你主张哪样的方法论或历史观,都要遵守而不能排斥这样的要求。一切严肃的、根据事实、言之成理的不同方法论、历史观的研究者,都有可能对历史提供重要的或有益的认识。我们要反对宗派主义,排除门户之见,要同一切严肃的、根据事实、言之成理的不同方法论、历史观的研究者讨论问题,汲取他们的成就,听取他们的批评,改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去真正实现提高科学水平的目的。这应该是一种科学上的自觉,只可坚持,不可动摇。或者有人说,抗日战争太复杂,这样的要求未免不现实。回答是历史研究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上的克隆技术,要再现出一段同样的历史;有许多细节人们是永远不会知道了。但是历史上有过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永远也不会依照人们的主观愿望随时改变。历史的大纲节目、基本轮廓、前因后果、大是大非、运动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不然的

话,就不会汲引人无止境的追求了。每一段历史都是检验科学研究能力、人们思想力量的场所。抗日战争史也无非是这样一个场所。真理的光芒有时是会刺眼的,服从真理的人都会勇敢地去面对它。

推进科学是众人的事业。我们期待这次有国内外知名学者、各方面专家参加的讨论会,将使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再迈上一台阶。

## 中国的胜利仍在扩大、发展

井上清

尊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尊敬的前辈及同学诸君:

在纪念七七事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之际,能给我这个机会,谈几点感想,我感到非常荣幸。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自 1894 年甲午战争以来不断扩大的对中国侵略战争的最后、最大阶段的开始。在这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中国民族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中国的胜利在七七事变已经过去 60 年后的今天,仍在进一步扩大、发展。其最大的事实证明就是,100 多年前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最初被割让去的香港岛和九龙地区在今年 7 月 1 日,已经平稳地归还给中国。这意味着完全否定帝国主义的世界史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的时代,我的祖国日本仍有一部分势力尚未从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梦幻中醒来,他们称什么自由主义史观、民族自豪史观,否定近代日本对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侵略事实,不仅不反省,还赞美这是民族的发展等等。

在这种时候,在七七事变 60 周年之际,于事变发生地卢沟桥召开从学术上明确事变历史意义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对日本国内追求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的人民的巨大援助和鼓励。

我期待并确信,这次学术讨论会在学术上和思想上都能取得巨大成果。谢谢各位。



## 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三点意见

李云汉

主持人、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本人是个在抗战烽火中长大的人，抗战开始时，11岁，是个小孩子；到抗战胜利时，已是19岁的青年人了。就这点言，我有资格作抗战历史的证人。本人也是个在台湾从事历史研究40多年的人，研究范围为中国国民党史和抗战史。就这点言，我有资格作各位学者专家的同行人、同道。现在，我就想以这两种身分，提出三点意见，供大家相互勉励、参考。

第一点意见，是弘扬抗战精神。抗战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团结爱国、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它是我们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要凭藉。当时日本是强国，我们是弱国，我们之能够以弱敌强，是因为我们充分发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发挥了无比强大的民族潜力，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我们纪念“七七”，纪念抗战，并非只举行一个纪念会或讨论会，主要的乃在于每一个人能够充分认识抗战精神，并予以发扬光大，那样才更为真实，更有意义。

第二点意见，是扩展抗战史研究的范围，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学术研究。关于抗战史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团体在推动，海峡两岸的学者也有了很不错的研究成就，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然就个人的观察，觉得我们的研究偏重于军事和政治，及一部分外交，对于学术文化、社会经济等范围，尚甚少触及。抗战，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要历史阶段，一切思想、制度都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们应作历史全面性的探讨，才能真正显示出这一伟大时代的真实面。当然，我们是要作学术研究，以正确的原始史料为立论依据写出信史。若干当时发表的政治宣传性文字，并无太多的史料价值，不能作为研究的基本依据。否则，研究的结果仍然是以偏概全，毫无价值，甚至会滋生不正确的负面影响。

第三点意见，是加强两岸间的学术交流。我们的国家正在由分裂到统一的路上，两岸间的学术交流有其很重要的功能。目前两岸学术交流已有很好的成绩，个人则认为仍不能令人满意，仍须加强，尤其希望两岸政府能有更多的规划，支持和奖励，期能建立更多更便捷的交流管道，逐渐就多方面历史问题建立共识。史料方面更可互用互补，求全求真。

最后，除对主办单位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之外，并祝大会圆满成功，各位女士、先生健康愉快。谢谢。

## 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的觉醒

### 金冲及

一个民族的形成，最根本的条件是要有共同的经济文化联系、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活动地域以至共同的血缘关系等等；同时，也需要民族的成员之间能够经过长期的相互沟通而形成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否则它还只是一个散漫的人群，很难说已经形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民族。

这种民族的自觉，也是历史地形成的，包括长期的文化薰染；但最好的教员，还是那种让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切身感到彼此命运与共、利害与共的事实。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中，抗日战争这个事实所起的教育作用，也许是其他事实难以比拟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到近代以来，却受尽了外来的压迫和欺凌。1894年，也就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但是在长期遭受外国侵略的条件下，中国的命运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是谈不上实现真正的民族振兴的。

20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日益成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九一八事变、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和接踵而来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这一连串悲惨的事实，唤醒并教育着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正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策划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达到高潮的1935年，诞生了唱遍全国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些悲壮的语言，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声。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从敌人进攻沈阳那天起，中国民众心理，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的记者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首歌曲曾流行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

在这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强烈情绪下，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为起点，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爆发了。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讲了一段十分有名的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些话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普遍的欢迎。今天在座的李云汉教授编了两本《卢沟桥事变史料》，收集了当年7、8月间各界人士的谈话、社会团体的宣言和80多篇全国报刊的社论短评。它们的中心内容就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只有共同奋斗，才是活路。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几个重要文学刊物联合出版一种期刊，刊名叫《呐喊》。创刊号上，著名作家巴金写了一篇《一点感想》，里面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就会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全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旦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著名作家茅盾写了一篇《写于神圣的炮声中》，里面说：“现在半个中国已经响彻了炮声。这就是中国民族求独立自由

的伟大的怒吼!我们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我们所得的代价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自由。”

巴金和茅盾两位都是中国第一流的作家。他们表达的不只是一种理念,而且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理念和感情是溶为一体的。它至少包含着几点: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二,个人的命运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也谈不上个人的前途;三,个人利益最终应该服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可以为它奉献自己的一切,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民族的觉醒。这种觉醒,在以前当然也存在。但像这样广泛而强烈的觉醒,过去还没有看见过。前面所说的,还只是表现在文字上的。在实际生活中,面对着国破家亡的血淋淋的事实,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中国人用行动表现出来的民族觉醒,也许更广泛,更壮烈。连五台山的和尚也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出家不出国,抗日救国也有我们的一份。”像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岁月中,尽管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出现过一些逆流,包括复古主义的思潮,但总的来看,中华民族的觉醒总在不断增长。翻开当年的报纸和刊物,充满着这样的内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使人们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悲惨事实中认识到全民族的命运与共;介绍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和悠久历史;讴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和抗战行动中的无数民族英雄;发扬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八年的艰苦抗战,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比过去更加自觉地关心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了。

为什么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到八年之久,并且取得最后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了这种民族觉醒,并且在正确的领导下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形成一股可以淹没一切侵略者的巨大力量。日本军国主义者原来以为“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为什么结果却是他们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后遭到没顶之灾?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他们对中华民族作了错误的估计,没有认识到有着几亿人口的中华民族一旦觉醒过来,它所蕴藏着的是何等

惊人的巨大潜力,这是任何力量也征服不了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作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常常都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巨大觉醒,不仅支持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一直延伸下去。历史进步的闸门一经打开,那股奔腾不息的洪流便会一泻千里地向前推进。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一旦站立起来,就会自强不息,奋起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曾经饱尝被外国侵略奴役的痛苦中华民族,自然决不愿意看到这种痛苦又降临到其他民族的头上。直到今天,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觉醒,仍在继续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在纪念卢沟桥事变 60 周年的今天,我们正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我们自然会回顾过去经历过的岁月,总结以往这个世纪留给我们民族的丰富精神遗产。我想,不可不说这样两句话:落后必将挨打,团结就是力量。中国当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落后的中国了。但是,为了最终摆脱我国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状况,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祖国大陆的辽阔国土上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孙中山先生曾经痛心指出:中国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族力量的涣散,有如“一盘散沙”。这以后,我们正是依靠万众一心的力量,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并使国家踏上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今后,我们依然需要具有这种万众一心的力量,实现我们先人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振兴中华。我们一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